

规训之术: 日据时期的台湾高山族教育

董建辉^a, 张雪婷^b

(厦门大学 a. 人文学院; b. 社会与人类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规训是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它塑造了个人。规训教育的目的是以规训为手段,生产出符合制度需求的个体。日据时期,日本当局为了巩固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在高山族地区设立日语传习所、“蕃人”公学校及“蕃童”教育所等,试图通过教育手段向台湾高山族灌输日本国家意识,改变高山族固有的语言及风俗习惯,生产出“驯服”的肉体,以服务于其殖民统治。日本殖民者操纵规训之术的意图不仅是达成肉体的顺从,更是通过重新建构高山族身体以达成对人的意识形态的教化及塑造。依靠国家权力的输入,透过教育对台湾高山族进行殖民统治,日本殖民者企图实现“同化”之目的。

关键词: 规训; 日据时期; 台湾高山族; 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07; 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9)04-0084-12

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满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进入50年的“日据时期”。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统治者就深感教育之重要,积极学习西方近代学校制度,建立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窃据台湾后,日本殖民当局在高山族地区设立从属文教局的日语传习所、公学校,以及从属警务局的山地教育所、蕃童国语教育所,并颁布蕃人子弟就读公学校的相关规定,掌控高山族的文化教育,通过强迫高山族学习日文、日语及日本生活方式等,对高山族的语言、思想、文化习俗及身体等全面进行规训。日本统治者认为“心性同化”是统治台湾的不二方法,在台湾建立起殖民教育体系,企图借由“日本人化”的教育方式,向台湾高山族灌输日本国家意识,以达到“国民统合”的同化目的,帮助维护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一、问题的提出

“规训”是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著作《规训与惩罚》中使用的关键性术语。“规训”的英文单词“discipline”在法文、英文及拉丁文中有训练、处罚、纪律、守则、教育、规章之意,也有知识领域中的课程、科目、学科之意。福柯认为,“规训”既是操纵、塑造和监视个人身体的驯服技术,也是制造知识的手段。这种产生于近代的特殊权力技术,福柯称为“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福柯提出,在监狱、工厂、学校、兵营及医院等多种制度中,这种规训无处不在。规训权力不同于传统君王权力,它隐蔽存在于身体中。人体是规训权力的对象和目标,现代社会是一个规训社会。

收稿日期: 2018-09-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研究”(14ZDB113)

作者简介: 董建辉,男,江西抚州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雪婷,女,河南洛阳人,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对监狱制度进行了探讨,指出现代监狱是规训权力的最直接体现,它剥夺犯人的身体自由及权利,并对其进行教养改造,与兵营、学校、工厂等没有实质差别。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中以规训、纪律及监狱为主要方式的体制,不同于旧的君主制度以“刑人于市”为主要形式的惩罚制度,亦不同于18世纪后半叶的人道主义惩戒模式。它以被规训的个人为操控对象,通过严格区分时间、空间及控制方式,有计划地训练人的肉体,对其采取操纵、驯服和调遣等积极(positive)手段,以达到对个体身体及意识进行控制和改造的目的。与以往相比,这种新的人体驯服技术并非将人体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是将其拆分为不同的单元,从姿势、运动、速度等方面进行掌控。通过这种新的规训之术,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即“驯服的”肉体。^[1]人的身体也因此变成被驯化的“机器”。

在福柯看来,现代学校也是一种规训机构,具有规训体制的典型特征。学校通过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安排,将教育过程转变为规训过程,教育变成了“规训教育”。规训教育是一种“制器性”教育,一种把人的生命本性抽象掉而使其工具化的教育,一种对人进行生产、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权力技术。规训教育的目的不是直接压制人,而是为了“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个体。为了使“生产”顺利进行,“生产”的合法性、合理性、产品规格、目的要求、生产流程、组织管理等都需要相关的知识论述,需要与之相应的运作“策略”。^[2]学校正是通过对这种规训技术的运用,对学生进行身体“驯服”。在这种体制下,学生“在成为新的权力机制的目标时,肉体也被呈献给新的知识形式。这是一种操练的肉体,而不是理论物理学的肉体,是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是一种受到有益训练的肉体,而不是理性机器的肉体”^[3]。

基于福柯的“规训”概念及相关理论,学术界提出了“文化规训”的概念。有学者认为,与监狱、兵营等规训权力相比,文化规训往往不带有强制手段,没有明显的权力介入,所以更容易被受规训者接受,内化为他们行动的动力。^[4]有学者运用“文化规训”这一概念,在论及少数民族乡村旅游的景观社区建设时,提出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对景观社区建设权的掌控,也是“相关机构运用福柯所描述的规训手段对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进行装饰、整合、规范、改造的过程和结果”。^[5]笔者认为,文化规训的背后必然涉及权力的介入,只是这种权力存在显性和隐性之分。但无论如何,文化规训这一概念的引入,的确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现象。鉴于国内学者未对“文化规训”这一概念给出清晰明确的定义,我们不妨基于福柯的规训理论,尝试对“文化规训”做一个界定,即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下,规训者利用文化手段(如语言、文字、信仰、道德、法律、习俗、艺术、规范等)潜移默化地改变或改造受训者的行为模式及思想观念,以达成规训者的特定目标的这一过程及结果。

日据时期,日本统治者在台湾输入殖民教育体系,教育的中心是日语。语言不但是教育的工具,而且也是教育的主要内容。日据之初,日本殖民者在高山族地区设立日语传习所,拉开了进行日语规训教育的序幕,目的是便于加强行政管理,巩固其殖民统治。日本人以“日语教育”及“国民道德”教授为普通教育的根本,认为“教育原住民应以德育为第一,智育为第二要项”^[6],以此达到同化的目的。这种对台湾高山族开展的殖民教育也是一种文化规训教育,其通过设立传习所、公学校、教育所,以达到监控、操纵和改造高山族身体、固有文化及风俗习惯的目的,使台湾高山族成为“驯良”之民。

学界对日据时代台湾高山族教育的研究,早期大多采取教育制度史的研究取向,如佐藤源治^[7]、吴文星^[8]等,而后期则在教育实践、教育政策、文化认同、社会变迁等多方面展开研究,如松田吉郎^[9]、驹込武^[10]、陈培丰^[11]等。这些研究大多围绕日语教育,在殖民地教育史的宏观框架下,探讨日本殖民政府如何利用教育及语言政策,影响殖民地人民的宗教、思想及民族认同,进而对“日本”“天皇”产生敬意,以达到“文化统合”的文化认同。其中张耀宗和许佩贤两位台湾学者的研究对本文启发较大。张耀宗发表了《摩登新体验:以日治时期原住民的学校生活经验为焦

点》^[12]、《身体的转化:日治时期蕃童教育所体操科之研究》^[13]、《日治时期的蕃童教育所学艺会的创办与发展》^[14]、《部落之外:日治时期蕃童教育所修学旅行之探究》^[15]和《身体的展演:日治时期蕃童教育所的运动》^[16]等系列论文,主要运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分析日本殖民者对台湾高山族进行的带有现代性的殖民学校教育,如何影响台湾高山族的身体和心理。他提出,无论是体操、学艺会、运动会抑或是游学旅行等,其目的都是为了将“现代性”教育迅速移植入高山族社会,从而改变他们的认知观念及行为习惯。张的研究之不足主要是对殖民教育的“殖民性”理解不够深刻,忽视了日本殖民教育背后的政治意图。

许佩贤在其著作《近代学校》中,收录了多篇有关日据时代台湾教育发展的文章。许对台湾教育史的研究跳脱了单纯制度史研究的窠臼,另辟蹊径,转而从文化史及社会史的角度切入。她从规训的视角探讨日据时期殖民当局是如何通过设立初等学校、开设体操与唱歌科目,以达到规训儿童身体的目的。并提出,通过对身体的规律化训练,儿童的身体不再是个人的身体,而是隶属于国体的身体。^[17]此外,许亦指出,学艺会乃至学校本身就是“规训的舞台”。^[18]许的研究颇具新意,诸多观点也很有见地,但遗憾的是忽视了台湾高山族教育的特殊性,将高山族学生与普通学生不加区别地对待,所以无法充分揭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高山族的规训教育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本文从福柯的“规训”概念及理论出发,将台湾高山族教育从台湾教育史中单独抽离出来,通过简要回溯日据时期台湾高山族的教育史,剖析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高山族推行的“文化规训”实践,揭示其对于高山族从语言、思想到身体及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全面规训,以便我们加深对日本殖民统治及其对台湾高山族教育本质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今多元文化视角下台湾高山族教育的发展提出反思。

二、规训教育的实践:驯服受教育者的躯体

语言是文化交流和表达的手段,文化的同化首先在于语言同化。日据时期,日本殖民当局以养成忠良国民为本义的对台教育政策,其重中之重就是促使台湾语言“日本化”。台湾总督府曾直白地表示,“学习国语(日语)这件事,就是要透过语言、文字来谋求民族性的结合。借由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文字,可以培养出同类意识,忠君爱国的精神也可以与此意识一起培养出来。”^[19]1895年日军占领台北后,在前巡抚衙门(今台北市中山堂旧址)设立台湾总督府,作为统治台湾的最高机构。总督府内设总督官房、陆军局、海军局、民政局,民政局下设学务部,为全台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总督府将日语教育作为在台语言政策的基本方针,以期达到“开通彼此思想沟通之管道”^[20]的目的。同时将日语确定为台湾“国语”,并编写日文教材。

初期,台湾总督府对汉文教育尚采取宽容态度,认为“应神圣保留文庙等,且应注意尊崇之;不破坏采用科举考试之法”^[21]。为了对抗传统私塾的影响,当局只是想办法招徕学童至日语传习所学习。但随着日语及日文的推广,他们开始不断压制汉语及汉学教育,认为“以往支配本岛人脑袋者属孔孟道德,书院书房于本岛亦以孔孟为典型而建造,如果再听之任之,“政治及教育同时皆难达成其目的”。^[22]1898年《公学校规则》颁布后,“以培养国民性格同时使其精通日语为主旨”^[23]的日语教学逐渐占据压倒性地位。1919年殖民当局颁布《台湾教育令》,重申日语教育的重要性,指出“此实乃千古不灭之经典,乾坤之柱础……台湾之教育在于观察现今世界人文发达之程度,启发岛民顺应之智能,并涵养其德性及普及国语,使其具备帝国臣民之资质与品性……得以荣光帝国臣民身份,永享太平之乐。”^[24]1922年《新教育令》实施,台湾学制进一步日本化,汉文改为选修科目,升学考试必须用日文。

台湾高山族教育,早在清代就已开启。有清一代,社学在部分“已开化”(即“熟蕃”)的高山族地区呈发达状态,教育“蕃童”以传授礼仪为目的,“蕃童”在“土著社学”学经书、习汉字、讲官话。

社会学制度解体后,又在蕃社设义学。在“开山抚蕃”政策指导下,义学授课以儒家经典为主,使“蕃童”知书达礼。日据之初,日本当局就认识到高山族教育对于其掠夺台湾山地资源的重要性。台湾总督府首任民政局长水野遵提出,“教育蕃民是我政府责任……台湾将来之事业在蕃地,若要在山地兴起事业,首先要使蕃民服从我政府。”^[25]

殖民者对台湾高山族的教育同样是从语言文字的规训入手,在压制甚而摒弃汉语教育的同时,推广日语及日文教育。这种看似“温和”的规训手段,其实是在潜移默化地瓦解汉文化的根基,并改变高山族的传统文化样态,进而改变高山族的文化认知及意识观念,将日本文化悄然渗入高山族的日常生活中,使他们被驯服为“荣光日本帝国”的“顺民”。从日据初期开始,教育事业即被列为殖民者配合抚育及授产的重要施政方针之一。“蕃地”教育事业的重心主要在“蕃童”,同时也兼顾对成年“蕃人”的抚育。^[26]对“蕃童”的教育最初以开设日语传习所的方式展开,学日文、讲日语成为殖民者灌输其国家意识的最初手段,这也是进行规训教育的基础环节。

(一) 日语传习所

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就提出,“如果将使本地人永远作为帝国之臣民,应使本地人学习日语,在本岛之统治上帝国之发展上,是最为重要之关键。……至于原住民之语言,将来着手绥抚原住民时,将比现在更加困难。……因语言之不通而有不少障碍。”^[27]在他的思想指导下,1896年总督府颁布《国语传习所规则》,设立恒春国语传习所等14间国(日)语传习所,“以开日本语传习之途,以谋施政上之便,进而奠立教化之基。”^[28]因恒春支厅“所在地内的蕃人较温和顺从,沟通互畅,彼此相互之事亦相通,关系日益密切”^[29],日语传习所开设后教育效果显著,遂决定于恒春城以东四里的“生蕃”居住地猪鬃束社设立分教场。1896年9月2日,“恒春国语传习所猪鬃束分教场”正式开设。与一般日语传习所不同,分教场要求“募集学生的种类、年龄或其他关于学校的编制、学科的细目、上课时间或学生约束办法等,别拘泥于规章,要设计合适的方法。依其难易采用不同方式,绝对不可与寻常一般的学校等同看之”^[30]。这种分而治之的方式是殖民者对“蕃人”教育的最早尝试,也是日据时期台湾高山族教育之开端。

1897年11月3日,台东厅长相良长纲在台东卑南社分教场及马兰分教场举行开学典礼致辞时说:

所谓生番者,虽然资性顽凶,但亦极为单纯,从不介滞细微之事于胸中,而儿童之辈,更是清白纯洁者,因此儿童在上课时,皆能虚心,逐一学诸先生之言行,模仿先生之一举一动,立即可浸染儿童之肺腑。……国语与其他种种事业有异,一旦习得时不仅经过千百年,亦绝对无法湮灭,若要教育蕃人,对于其精神之改造裨益颇大也。……在彼等空虚之脑内,注入日本之精神,令其知国家为何物何物,以一身附和将来之安危,纵然有敌国之来侵犯时,必然能粉身碎骨,为义勇报国,若不殄生灵,敌人亦无法踏入一步者,并非前山三路之台湾人,而是此后台东之生番也。^[31]

殖民者认为,“蕃人”生性单纯,尤以“蕃童”更易接受外来文化及教育,对其施以日语及礼仪训练,可从小改造其精神质性,认同日本“国民”的身份,服从殖民者的统治。国家有需要时,这些被教化的“臣民”便能心甘情愿为国捐躯,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一把“利器”。这种从心灵到身体的训练,充分暴露了统治者的殖民意图。他们所要施行的“理蕃”政策,实则为操纵规训之术,以满足其军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欲望。

1898年9月的各县厅学务主任会议曾提交讨论《蕃人教育方案》,该方案强调:不应高山族的风俗习惯过多干涉;学生以附近蕃社为主,给各社分配固定的名额,令学龄儿童入学;修业年限不做限定,毕业视课业掌握程度而定;设立奖助学金,资助高山族学童,按出席、课业成绩及品行进行考量。学习科目分学科及实业两种,其中学科为读法、算术、习字、唱歌及体操,实业为极简单的农业、山林业及简易手工。读法要求“应教授学生的文字仅止于假名汉字及数字,汉字应尽量避免教

授;教授读法时,主要应让其练习以假名文字拼出蕃语,而最初应以蕃语教授,之后再将其译成日语”^[32]。算术每周四次以上,“因蕃人在数理上的知能极低,故教授算术时,应以极浅易者为要”^[33]。习字每周两次以上,主要以实用为主。唱歌、体操每周两次以上,一次约半小时。“学科中如唱歌最为蕃人所好”^[34],故教育“必须诱导到这个兴趣圈内”^[35],“尤其是体操乃培养规律、服从这二种精神不可或缺的课程”^[36]。至于实业科目,教授时“须尽量以蕃人原有事物为基础,以使其改良进步为方针;勿教之以高深者,应教之以简易者并力求令其熟练之”^[37]。

日本殖民者以“尊重蕃情”赢得高山族好感,用奖助学金吸引“蕃童”入学,在科目设置上注重学童的接受能力,目的是让高山族儿童自愿接受规训。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实行严格的时间管理,精密计算每周的课程及上课时数,要求学生自始至终都浸入其中,确保时间利用的质量及教学成果的完成,这些都是规训教育的要求。特别是对体操科目的强调,要求学生在课堂上每学习一个姿势,都要在规定时间内保持特定的动作,以确保分解动作的精确性及肉体对时间要求的适应。这种集体性的强制性训练,强化了个人在动作和姿势上对命令的服从,帮助培养出训练有素的被规训的肉体。

日语传习所废止之前,在恒春、台东两厅管辖下的高山族地区,计有国语传习所2间、分教场11间,日语教育初具规模。因为此一时期为日本据台初期,台湾人民反抗斗争不断,如何站稳脚跟、巩固统治是殖民政府首要考量的问题,所以在高山族教育方面的举措也尽可能以稳定民心为主。以高山族语言为媒介推广日语教育,并辅之以公费教育补助,以期使高山族能接受日文、日语,进而顺利推行日本文化,实现同化教育,是日本统治者在殖民台湾前期制定高山族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

(二)“蕃人”公学校

1905年,国语传习所官制废止,对“蕃童”教育的日语传习所分教场也随即停止运作,取而代之的是将高山族学童转入公学校就读。当年2月25日,总督府发布《蕃人子弟就学之公学校教育相关规程》,将高山族学童教育转由地方政府负责,并入地方教育体系中。该《规程》规定,“蕃人”子弟在公学校就读年限为四年,所教授科目为修身、国语、算术,另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农业、手工及唱歌等科目,教材由警务局编纂。^[38]当时“蕃人”子弟就读的公学校计有:圆山埔公学校、高士佛公学校、马兰公学校、知本公学校、太麻里公学校、璞石阁公学校、太巴塢公学校、薄薄公学校、太鲁阁公学校、蜂芒公学校、吕家公学校、巴糊卫公学校、水尾公学校、蔴老漏公学校、台东公学校、花莲港公学校、蚊蟀公学校等。^[39]

由表1可见,从1905年开始,高山族学童接受教育的公学校及班级、教员、学童数都在逐年增加,规模渐趋扩大。

表1 “蕃人”公学校状况统计表

	学校数	班级数	教员数	儿童数	毕业生
1905年	15	26	35	966	0
1910年	17	42	51	1732	120
1915年	23	70	87	2889	216
1920年	28	111	148	4707	614

资料来源:台湾教育会编《台湾教育沿革志》,东京:青史社,1982年,第503-504页

1914年4月18日,总督府又发布《蕃人公学校规则》,将高山族就读的公学校改为“蕃人公学校”。“蕃人公学校”设置的目的在于培养“蕃人”成为顺良之民,但因“蕃人”各族群内部差别,语言及风俗习惯殊异,所以殖民者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实施教育方案。四年制及三年制的蕃人

公学校教学科目以日语及实科为主,较之日语传习所增加了“修身”一科,以进行德育教育;将读法替换为日语一科,教授简单日语,授以假名及简单汉字读法与写法,并教授日语写作;取消体操课程,减少唱歌科目的授课时数;增加实业授课时数。在此基础上逐渐增加日语科目的授课时数,以“使其感化本国风气为主旨”^[40],1919年每周增加两次,到1921年再增加为每周8次。

“蕃人公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的最大变化是,在加强日语教育及前期训练服从命令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学生意识形态的规训教育。“修身”科目的设置,实质上是规训之术从身体过渡到主体意识的体现。高山族学童个人的身体已被打上规训教育的烙印,进而通过灌输日式礼仪及参与日式节日,完成日本国民化主体意识的培育。“蕃人”公学校规定,在日本的纪元节及天长节,学生都必须到校集合,参与举行仪式,以达到“化导新国民,崇拜皇室,培养爱国家之民性”^[41]的归化目的。1905年10月下旬,台东厅下辖蕃人公学校学生于天长节表达祝贺心意,书写《君之代》的歌名及歌词全文,日本皇后知悉后表示“非常满意皇化普及的现状”^[42]。

此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步伐,继打败俄国、朝鲜后,又开始觊觎中国,其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也日渐稳固。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殖民当局加紧了对台湾物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反映在高山族的教育政策上,则体现为更加注重实业,对成年“蕃人”教授耕作、饲养、捕鱼及物品制作、加工、保存、利用等知识技能,以配合对台资源的掠夺需求。

截至1935年,以招收“蕃人”子弟为主的公学校,在台东、花莲港两厅辖下普通行政区域内有24所,在台中及高雄两州辖下蕃地有5所,合计29所,学籍儿童5000余人,就学率达74%。^[43]日本殖民当局对高山族儿童进行规训的初等基础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 “蕃童”教育所

1902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南部各要地设立警察官吏派出所,一手掌管治安、教育、产业、交通及卫生等所有部门。一般派出所约有3—4名职员,其中巡查一人,他还要负责一个蕃社,包括日语指导、作物栽培指导、道路修缮、药物调度,以及治安风纪的维持。^[44]“日本警察在原住民区域高度集中的现象,显示出日本是意图采取规训与惩罚的压迫式管理体制”^[45],以“谋求渐次驯化彼等”^[46]。这种借由警察官吏进行的特殊教育被称为“蕃童教育所”。1920年出生于雾社的布农族人高聪义先生回忆:

日本时代原住民所读的学校和日本人、平地人不一样;日本人念的是“小学校”,平地人进“公学校”就读,原住民则入“教育所”。台湾总督府每年有一笔专门拨给原住民小孩就学的经费,由总督府直接派督学(“视学”)到部落中选择,进一步加以培养。^[47]

可见当时日本人与高山族的教育仍存在差别,对高山族的教育“未必教授学术,仅教授简单之起居动作、礼仪及救急治疗”^[48],其教育目的并不在于提升教育水平及教育环境,而是在于绥抚,使高山族安于成为被统治的臣民。

蕃童教育所最初设立时,并无可依据的标准,几乎处于放任状态,1908年才颁布《蕃童教育标准》。该标准表明,“蕃童”教育所开展的基础教育,教授科目并非主要目的,而是主要灌输日本风俗习惯及对天皇“忠”、对父母“孝”、对长者“顺”、对子女兄弟夫妻“爱”、对朋友“信”等道德观念,并对“蕃童”的身体进行集体规训,教授坐、立、注目、点头、鞠躬等敬礼,左避、向导、随行等让路礼节,日本和室坐姿及用餐礼节等。日式道德观念特别强调对天皇效忠,这也是中后期日本殖民者对于高山族实行规训教育的重要内容。他们试图以日本人的行为举止及道德观念约束高山族,以便使高山族个体不断改变行为方式,成为柔顺服从、严守纪律之人。

1928年,日本殖民当局废止《蕃童教育标准》,颁布全新的教育标准。新标准更加关注“蕃童”的身体发展,强调德育教育及日语研习,“使变昔日危险之地,为繁盛之区;去犷猛之土俗,以浴皇风而为良民者”^[49]。其中对日语学习的要求尤其高,力图达到“知晓普通之语言文章,培养正确表达思想之能力,兼启发德智尤其是有助涵养国民精神为要旨”^[50]的目的,要求正确发音,语调流畅,

作文能清楚表达主旨。每周授课时数第一、二学年为7课时,第三、四学年为8课时。画图科目则注重培养“蕃童”喜爱清洁、崇尚精密的习惯。实科为耕作、除草、栽培、饲养、制作加工等,每周授课时数和日语相同。新标准同时规定,在元旦、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此日本传统“四大节”及始政纪念日,都需要集中举行仪式,^[51]以加强对日本风俗节庆的宣传及其“国民性”的培养。如1934年2月21日的纪元节,新竹州大湖郡举行了植树纪念仪式,并举办国语练习会、青年团训练及购买日本国旗等活动,^[52]培养高山族的“共同体”国民意识。

由于日本神道教信仰及天皇制的原因,新标准中还加入了祭祀、敬神等宗教规定,以此形塑“蕃童”的国民意识。如第一学年第二学期第九周以“天皇陛下”为教授主题,通过敬礼、立礼的实习,训练“蕃童”说话时的虔诚态度,并教授日本国歌《君之代》,以期培养“蕃童”忠君的观念及对天皇国家秩序的绝对服从,^[53]并确立其统治的正统性及神圣性。如1929年11月20日,于新竹州竹东郡下设的蕃童教育所举行的学艺会及体育会,会前合唱日本国歌,并用日语演讲。^[54]1924年出生于今屏东玛东村的排湾族人林义德先生回忆:

我在八岁时进入玛家教育所(今玛家国小)就读。当时教育所的教员都由巡察担任,优秀的山地青年常被挑选出来协助教学。教育所非常注重命令服从的训练。每天上午上课,学习国(日)语、数学、美术等,下午则上歌舞课或学习种菜;我最喜欢的两门课是美术和歌舞。^[55]

集体齐声“唱歌”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仪式性,不仅可透过歌词内容传达统治者的观念,而且还可透过听觉及身体感受接收特殊的韵律。能够唱某些特定的歌曲(如《君之代》),也被殖民教育者视为是否符合日本国民的验证标准。在学校的均质空间和时间中,与很多不相识的人齐声演唱相同的歌曲,这种体验产生了类似“想象共同体”的效果。^[56]日本殖民者正是以教育为手段,将高山族学童一个个洗脑成神国思想的信徒。通过这种规训教育,这些学童长大后,自然怀着“一旦缓急,义勇奉公,以扶翼天环无穷之皇运”的信念,成为日本对外侵略奋勇向前的尖兵。^[57]

1931年12月,日本殖民当局又制定《理蕃政策大纲》,提出“蕃人之教化重点在于矫正彼等之弊习,使其养成善良习惯及培养国民思想,注重实业科目教导,并以传授日常生活所需简单知识为主旨”^[58]。其中“矫正彼等之弊习”“养成善良习惯”“培养国民思想”均带有明显的文化规训目的,其主旨是操纵“蕃人”的身体,令其习惯于服从命令,成为温和驯良的“国民”。截至1935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高山族地区设立的蕃童教育所已达183所,班级数253个,培养毕业生1万余人(详见表2)，“蕃童”平均入学率达到近70%。

表2 “蕃童”教育所状况统计表(截至1935年4月底)

州厅	教育所数	班级数	儿童数	毕业生数	就学率(%)
台北	21	44	男 322	699	79.93
			女 353	619	98.04
新竹	30	38	男 795	1094	76.44
			女 690	490	65.21
台中	30	51	男 792	1570	85.93
			女 731	1145	83.68
台南	5	6	男 118	151	71.20
			女 46	41	42.02
高雄	42	47	男 1042	3015	58.06
			女 761	1016	43.61
台东	26	33	男 573	992	63.57
			女 499	392	54.63

续表 2

州厅	教育所数	班级数	儿童数	毕业生数	就学率(%)
花莲港	29	49	男 817	1044	82.72
			女 751	847	76.30
总计	183	253	男 4460	8804	71.97
			女 3831	4550	62.84
			8291	13154	67.59

资料来源:台湾教育会编《台湾教育沿革志》,东京:青史社,1982年,第505-506页

以下为1939年1月26—27日于台北州举行的日语演习会的记录“26日上午9时30分全体排列在校庭,在肃穆中扬升国旗、遥拜皇居并参拜神社,接着向皇军将兵献上感谢的默祷,在预定的10点高唱国歌、聆听知事的训诲;然后进行演习。”^[59]这一时期殖民者对台湾高山族的规训教育更进一步,试图将受训者完全转变为日本国民,“要将人心从底部重新训练”^[60],用一整套日式行为礼仪标准及国民准则要求高山族,规训之术在控制活动及支配时间中发挥作用。

日本殖民者将受训任务施加于高山族学童,通过逐步增加教育科目及相关内容,强化对个体的规制与监督,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干预、监控个体的行为及思想。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高山族地区大力培养精通日语且亲日的青年,逐渐替代旧的部落头目。他们以组织高山族观光的方式,定期安排高山族部落精英到日本国内及台湾岛发达地区观光,使高山族在“文化震撼”中对日本及日式文化产生崇拜之情,进而对殖民者的统治更加心悦诚服。犹如一名蕃人团员喊出的“我们青年团要成为出色的日本国民”^[61]一样,观光之行形塑着高山族的国民意识及使命感。在这种规训训练中,个体学会了如何管理自我,如何管理他人,以及如何成为好的治理者及被治理者,这种“自愿式效忠”能够更好地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

三、规训理论视野下的日本殖民教育

一般而言,帝国主义者对于殖民地的索求是“钱”,而不是“人”。可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则不然,他们不仅排斥台湾本地固有文化,而且极力灌输日本文化及其国民思想,甚至强迫台湾人民接受日本生活方式的训练。日本殖民者在高山族地区建立学校,以规训教育为手段,从儿童时代开始对高山族实行控制和操纵,以便训练出符合日本“国民化”的躯体,塑造顺从殖民统治的“良民”。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为日本巩固殖民统治服务,其实质则是以规训之术对台湾高山族进行殖民教育。

规训对个人的塑造体现为一种操纵,是对人的多样性进行规则化及程式化训练的技术。规训的过程就是对肉体进行训练,通过对人体进行不间断地监视及控制,并尽可能地严密划分时间、空间以及活动事件,以纪律的形式达成目的,最终形塑、生产“驯服”的个人。这种“驯服”之术所达到的目的不仅仅是肉体的顺从,而且是通过身体的重新构建,达成对人的意识形态的教化及塑造。规训渗透在教育中,受教育的学生之身体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教育活动的烙印,并渗透到个人生活经历的记忆中。

福柯认为,规训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及检查这三种宏观手段的运用。层级监视使得每个个体无时无刻不被注视和监督;规范化裁决具有比较、区分、排斥等作用;检查则将层级监视及规范化裁决有机结合,使得个体在其中不断被规划、打磨,从而变得“驯服而又有用”。日本殖民当局从总督府制定高山族教育方案,到警务局负责高山族地区教育,再到各公学校、教育所的建立,层层向下,每一级都切实行使监督之权;在高山族教育中,殖民者实施的一整套奖惩机制,对高山族学童的不规范表现进行处置,完成了规范化裁决;对于高山族学生的检查则更多地体现在殖民教育大纲中的考试制度中,成绩的高低优劣一眼便知,学生的品行及表现也是检查的重要内

容。这种殖民教育正如福柯所言,是一种“全景敞视的(panopticism)圆形监狱”,在其中,规训权力通过对时间、空间的严密划分,对人的肉体、姿势、行为进行精心操纵,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及检查等手段训练个体,从而制造出按照日本殖民者所制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

除了这三种宏观的手段,规训的成功实施还在于以下四种微观技术,即空间分配术、时间控制术、活动编码术及组合编排术。

首先,规训之术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福柯用“分配艺术”来说明空间的分配,指的是规划出一个自我封闭的空间,再依据分割原则,对其进行分类和限制。这种空间分配是规训实施个体间隔、成员分类、单元定位、等级排列及追踪评价的行之有效的。在规训发生的空间内,空间不是一个大的整体,而是被分割成诸多细小的单元,并通过定位,确定每个个体在其中的固定位置。由此,空间内个体的一言一行都被监视、控制、评判。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地区开展的高山族儿童教育,从最初的日语传习所到后来的“蕃人”公学校,再加上“蕃童”教育所,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就读及毕业人数逐渐增多。日本殖民者依据蕃人不同的“进化程度”分而治之。例如,“北部蕃人进化程度极为低落,杀人猎头风俗仍然盛行,道德方面的陋习尚存,施予教育时,最需考虑;南部蕃地,尤其栖息于恒春、台东的蕃人,进化程度较高,甚且部分地方的蕃人热心于子女教育,首先就区域一分为二,以埔里社为中心,分南北两部分。”^[62]高山族学童在“被隔离”的教育场所学习,每学期的学业被追踪与评价,且教学活动及仪式的举办有不同的区域。这种空间分割之术,便于殖民者对高山族儿童进行分类管理。在差异化的空间里,每一个特定的空间都设置了不同的门槛,在比较的场域中,形成了不同空间分布的关系。这些不同的空间分布,其背后的决定原则各不相同,如此才能让殖民者的作为有所依据。^[63]

另一方面,个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并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处在变动之中,随年龄、成绩、表现等不同因素而变换。“人们通过这种变动,在由间隔序列划分的空间中替换着位置。它通过逐个定位使得有可能实现对每个人的监督,并能使全体人员同时工作。它使教育空间既像一个学习机器,又是一个监督、筛选和奖励机器。”^[64]事实上,对不同的高山族儿童进行分类教育,也是日本殖民教育的一贯方针。根据规定,学生不同年龄就读不同年级,根据学生成绩、品行及日常表现实施奖惩,从而确保教学活动中每个人的顺从。

其次,对时间的控制,主要通过时间表的制定来完成。时间表的制定,对于把握节奏、安排活动及调节重复周期有着重要作用,它以细化的时间及具体的活动规定了每个个体应做之事,建立起监督及命令的规范。日本殖民者对高山族儿童的教育科目有详细的规定,以学期为单位进行教学安排,按照重要程度安排每周不同的授课时数,且课程均有相应的授课时间表,这种“标准化时间最大的功能是在公众生活领域中塑造出不可迟到的‘时间励行规范’”^[65]。“蕃人”公学校规定每学期的教学日历,并规定如学年末、岁末年初、神社例祭日、始政纪念日及日本传统节日等放假时间。殖民者用细致的时间划分来对高山族儿童进行身体控制,限制其生活、学习方式。“时间的划分越来越精细,各种活动必须令行禁止,雷厉风行。”^[66]时间的分割日益精细化,并要求个人严格执行。再结合对身体与姿势关联性的强化(例如规定书写的姿势),实现对个人身体及其活动的控制。时间由此渗透进肉体中,从而达到对规训对象实行严格监控的目的。

再次,活动编码。指的是调节时间、肉体及精力的关系,根据受训对象水平、级别和类型的不同,制定差异化的规训内容,以此达到个人的“创生”(genesis)及规训的目的。规训者将时间划分为各自独立的片段,被规训的个体按照适合自己水平、资质的标准进行练习,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标准化动作,最后通过资格考核,获得相应的能力认知,并进行等级排列,以完成对身体的规训。这种“创生的筹划”把每一个人当作“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人变成一个可操作的“个案”。即“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个性的人”。^[67]日本殖民当局针对台湾高山族儿童受教育程度及接受水平低的特点,最初对修业年限不做限制,而是视学童对规程内课业的熟练程度而定,科目

设置大多较为基础,注重实用。但随着殖民统治的逐渐深入,对高山族教育的规划愈益详尽,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地区做出划分,科目设置的内容及复杂程度也随之变化,并制定了详细的课程计划表、授课时数及考核方案,以培养符合要求的被规训个体。教学过程在规训权力对时间的控制和干预下变成了流水线式的作业。

最后,借助某些手段进行“力量的编排”。即“建造一种机制,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68]。这种力量的编排,是一种从肉体中榨取时间和积累时间的技术,把单个个体的力量组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高效机制。这种高效机制通过控制、操纵个体而使其服从,因而带有很大的强制性。日本殖民当局对高山族儿童进行规训教育时,最初使用“蕃语”教授日文片假名汉字,以获得高山族认同,便于教育活动的开展;并以公费资助学生就读,所依据的是出席多寡、课业成绩及品行,其中最看重的是出席次数。此外,殖民当局还对寄宿学生有若干比例的伙食补助,并不时举办日本观光行,使高山族对日本的经济、文化设施及科学能力产生憧憬与感恩之情,“深深了解到日本人的伟大,了解到日本自古就发达”^[69],并“坚定地发下要当一个好日本人的誓言”^[70]。日本殖民者正是综合利用多种手段,以实现规训力量的“编排”,最终使得对高山族的规训教育达到理想状态。它借助被定位的肉体,被编码的活动和训练有素的能力,建构各种机制。在这些机制中,各种力量因精心组合而产生更大的效果。^[71]

总之,日本殖民者以日语为核心对台湾高山族的殖民教育,是依靠国家权力输入,达成对高山族思想、语言、行为、风俗习惯的一种强制性“规训”。正如福柯所言“这种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它监督着活动过程而不是结果,它是根据尽可能严密地划分时间、空间和活动的编码来进行的,这些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地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之为‘规训’(disciplines)。”^[72]语言是思想表达的手段,身体也是意识对外输出的途径,通过对语言及肉体的操纵、监控,以达成规训的目的。这种规训之术的目的是,重新编码高山族固有文化,并用日式文化取而代之。

台湾高山族固有的传统教育大多以生活和文化遗产为中心,女人从小需要学习耕种及家务,男人则须熟练掌握狩猎与战斗技巧,部落伦理则从部落长老会议的运作中习得。这种教育大多是依靠上一辈口耳相传,复制上一辈的经验而得。日本殖民者的入侵,带来了现代性的“文化规训”教育形式。在大力推行日式文化的背景下,高山族的传统文化及教育方式逐渐被消解。伴随着这种知识观的转变,高山族诠释世界的认知结构也跟着改变,教育遂成为一项个体转化的计划,其过程甚至是无声无息的心灵改造工程,殖民者借此顺利进行思想和身体的控制,^[73]最终达成巩固其殖民统治的目的。

四、结语

福柯认为,规训塑造了个人,规训教育的目的是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个体。这种规训之术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74]。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时,正是利用这种精心设计的规训之术,通过教育的手段,建立学校这种规训机构,对高山族实行监视、控制、操纵,训练符合日式“国民化”的肉体,“把顽固肉体的土著从驯服的生物变成次等人类”^[75]。“帝国主义其现代形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是(或声称是)一种教育活动,它十分有意识地表明要实行现代化、发展教育与文明”^[76]。通过实践教育的过程,使得高山族学生掌握了现代生活的基本内容,但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一方面是宣传日本的历史,另一方面则是压抑高山族的历史。^①透过

^① 萨义德认为,殖民地学校向当地资产阶级青年讲授历史、科学和文化的重要历史事实,但学生仍是一个存在于其生活之外的权威的依附者。参见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18页。

教育对高山族进行殖民统治,这种非暴力的殖民统治形式,隐藏在温柔外衣下的却是殖民者的“同化”目的。日本殖民当局这种极端的同化教育,对高山族的言语及本土风俗的传承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使高山族产生严重反感,并激发起他们强烈的反抗意识。日据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台湾高山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反观今日台湾高山族之教育,需要摒除过去压抑高山族文化的做法,要在尊重高山族文化的基础上,根据多元文化的精神要求,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保存并创新高山族文化,构建不同文化对话的平台,以促进族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正如萨义德所言,“更充满同情、更具体地、更相对地考虑他人。但这也同时意味着不去企图统治他人,不去把别人分类、分高下,特别是,不去不停地强调‘我们’的文化或国家是天下第一。”^[77]如此,台湾高山族的教育事业才能焕发生机与活力,实现“美美与共”。

注释:

- [1][3][64][66][67][68][71][72][74]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远、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54-156、175、166-167、169、215、182-184、188、155、193页。
- [2]王小红、杜学元《学校规训教育与人的异化——福柯规训理论透视》,《教育研究与实验》2011年第5期。
- [4]乔玉成、常乃军《人类体质的文化规训》,《中国体育科技》2011年第5期。
- [5]孙秋云、魏巍、马媛《论景观社区建设中国家力量的介入及其文化规训——基于对贵州少数民族乡村旅游社区实地调查的阐释》,《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 [6]台湾总督府警察本署编《日据时期原住民行政志稿·第一卷(原名:理蕃志稿)》,陈金田译,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7年,第217页。
- [7]佐藤源治《台湾教育の进展》,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 [8]吴文星《近十年来台湾关于日治时期教育史研究之动向》,《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1年第5期。
- [9]松田吉郎《台湾原住民与日本語教育:日本統治時代台湾原住民教育史研究》,京都:晃洋書房,2004年。
- [10]驹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的文化统合》,吴密察、许佩贤、林诗庭译,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7年。
- [11]陈培丰《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台北:麦田出版社,2006年。
- [12]张耀宗《摩登新体验:以日治时期原住民的学校生活经验为焦点》,《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016年第2期。
- [13]张耀宗《身体的转化:日治时期蕃童教育所体操科之研究》,《台南大学教育研究学报》2015年第1期。
- [14]张耀宗《日治时期的蕃童教育所学会的创办与发展》,《教育学志》2013年第29期。
- [15]张耀宗《部落之外:日治时期蕃童教育所修学旅行之探究》,《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016年第1期。
- [16]张耀宗《身体的展演:日治时期蕃童教育所的运动》,《台湾大学教育学报》2011年第2期。
- [17][18][56]许佩贤《殖民地台湾的近代学校》,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5年,第198-221、274-291、218页。
- [19][35][48][52][60][61]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理蕃课编《理蕃之友·第一卷》,陈连浚译,新北:原住民族委员会,2016年,第77、99、214、307、390、148页。
- [20][21][22][43][46][50]台湾教育会编《台湾教育沿革志》,东京:青史社,1982年,第6、47、96219、480、483、492页。
- [23]《台湾公学校规则》,《台湾总督府府报》1898年8月16日。
- [24]《台湾教育令施行二關スル件》,《台湾总督府府报》1919年2月1日。
- [25]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日本据台初期重要档案》,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7年,第146页。
- [26]董建辉、郑伟斌《文化“理蕃”:日本对台湾原住民族的殖民统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 [27][31][41]台湾总督府官房文书课编《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八)教育系列之一: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教育史料汇编与研究(下)》,林品桐译,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0年,第1454、411、1382页。
- [28][29]《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规则》,《台湾总督府府报》1896年9月25日。
- [30][44][59][69][70]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理蕃课编《理蕃之友·第三卷》,陈瑜霞译,新北:原住民族委员会,2016年,第139、217、84、8、17页。

- [32][33][36][37]台湾总督府官方文书课编《台湾总督府公文——明治三十一年乙种永久保存第五十三卷》，1898年（V00311/A047）。
- [34]《蕃人公学校》，《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1906年3月13日第2版。
- [38]《蕃人ノ子弟ヲ就學セシムヘキ臺灣公學校教育ニ關スル規程》，《台湾总督府报》1905年2月25日。
- [39]《设立蕃人公学校》，《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1905年2月16日第3版《蕃人公学校设立》，《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1905年3月28日第2版《蕃人公学校の増設》，《台湾日日新报·日文版》1905年4月6日第2版。
- [40]《蕃人公学校规则》，《台湾总督府报》1914年4月18日。
- [42][62]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理蕃课编《理蕃之友·第二卷》，黄幼欣译，新北：原住民族委员会，2016年，第52、51页。
- [45]荆子馨《成为“日本人”：殖民地台湾与认同政治》，郑力轩译，台北：麦田出版，2006年，第188页。
- [47][55]蔡慧玉《走过两个时代的人——台籍日本兵》，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编，1997年，第275、199页。
- [49]《教育蕃童之现状》，《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1910年7月19日第5版。
- [51]台湾总督府警务局《蕃人教育概况》，台北：台湾总督府警务局，1935年，第85-91页。
- [53]松田吉郎《台湾原住民と日本語教育：日本統治時代台湾原住民教育史研究》，东京：晃洋书房，2004年，第162页。
- [54]《蕃童教育所——学艺会兼体育会》，《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1929年11月20日第8版。
- [57]林育柔《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对台教育的意识形态取向分析——以修身教育上之实现为例》，花莲：慈济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45页。
- [58]《理蕃政策大纲(略记)》，《台湾日日新报》1931年12月29日第2版。
- [63][73]张耀宗《台湾原住民教育史研究(1624—1895)——从外来者的殖民教化谈起》，台北：台湾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167、160页。
- [65]吕绍理《水螺响起：日治时期台湾社会的生活作息》，台北：远流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第81页。
- [75][76][77]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39、318、478页。

[责任编辑: 陈双燕]

The Technique of Disciplinary Power: Aboriginal Education in Taiwan i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DONG Jian-hui^a, ZHANG Xue-ting^b

(a. College of Humanities; b.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Disciplinary power shapes the individual. The aim of disciplinary education is to produce individuals conforming to the system.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in Taiwan,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set up Japanese training institutes, public schools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centers for Taiwanese aborigine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its colonial rule. It attempted to instill the national ideology of Japan in Taiwanese aborigines by the way of education, and sought to change the native language and customs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by using the technique of disciplinary pow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rs used the technique of disciplinary power not only to secure the obedience of Taiwanese aborigines, but also to remodel their ideology. They were attempting to achieve "assimilation" through colonial education by applying the force of state.

Keywords: disciplinary power,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aiwanese aborigines, education